

主编·陈国民·俞正熙·陈隆涛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海外同仇

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战士

刘克军 陈郁 徐宝君 著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海外同仇

——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战士

刘克军 陈郁 徐宝君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晋]新登字 3 号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左执中
装帧设计	易 一

海 外 同 仇

——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战士

刘克军 陈 郁 徐宝君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7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440-0749-9

G·750 定价: 5.70 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薄一波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

序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场战争却依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在中国烧杀抢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汉奸败类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种种丑恶卑劣行径；不愿做奴隶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奋起杀敌、浴血抗战，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最为辉煌的篇章，永远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育。

抗日战争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我国的独立和振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解放的斗争，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广泛参加的反侵略战争。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维

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外敌侵略、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重温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注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发展，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迎接中华民族现代发展过程中光辉灿烂的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出版了。它以鲜明的爱憎、生动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可以帮助青少年读者了解这段历史，从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中受到震撼和启迪，以激发爱我中华、锐意进取、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壮志豪情。尽管丛书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反映伟大抗日战争的全貌，在构思与人物、事件的选择上也不是尽善尽美，但对青少年进行切实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它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材料。

杨成武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目 录

中国人民之友

- 记史沫特莱 (1)

新中国不屈不挠的朋友

- 记路易·艾黎 (26)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 记马海德 (49)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 记白求恩 (65)

印度人民的友好使者

- 记爱德华 (92)

八路军的臂助

- 记柯棣华 (104)

女中豪杰

- 记斯特朗 (124)

美国抗日名将

- 记史迪威 (135)

飞虎队的老将军

- 记陈纳德 (149)

抗日战场上的“日本八路”

——记小林清 (170)

既是朋友又是主人

——记爱泼斯坦 (197)

中国人民之友

——记史沫特莱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中间，一座用花岗岩石料修砌的墓前，矗立着一块大理石制作的墓碑，碑上面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元帅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书写的碑文：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遵照史沫特莱生前的遗嘱，把骨灰埋葬在中国土地上的要求，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后，她的骨灰被运回到她播下真挚革命情谊种子的中国。

(一)

史沫特莱全名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892年2月23日诞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附近史沫特莱农场的一幢

仅有两个居室的小木屋里。家境贫寒，一家人全靠父亲母亲在农场里勤奋耕作，维持生计。几年后，为了谋生，父亲携带全家搬迁到科罗拉多州的南郊和新墨西哥州的北郊。父亲在洛克菲勒财团的一个煤矿上当工人。史沫特莱的童年，是在贫穷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她16岁那年，在母亲因劳累和贫困去世后，为了探求真理，追求光明与美好的未来，毅然只身走出家门，踏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

为生活所迫，史沫特莱先后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书刊推销员等。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去一个慈善机构主办的学校免费读书。在纽约的一所师范学校，她当过学生刊物的编辑和打字员。在念夜大学期间，投身于政治活动，开始在《纽约呼声报》工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撰稿，同时参加了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18年当局指控她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被捕入狱6个月。交保释放后，她怀着满腔悲愤流亡到欧洲，在德国柏林旅居了8年，以教授英语维持生活，同时攻读德语，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1927年，她在养病期间，开始写自己的长篇自传《大地的女儿》。书中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她一家不幸和辛酸的往事。从书中可以感触到，史沫特莱那颗饱经蹂躏而不屈服的心，在深深的黑暗中挣扎、跳动。史沫特莱本人在反抗与奋斗中，倔强地成长起来。书中记录下了她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和誓言：

“死，也会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种为美而死的人，我是属于因为其他原因而死的一类人——为贫困所折磨，为财富与权势所欺凌，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我们中间

也有少数人的死，是由于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或幻灭，而感到绝望；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源泉’。因为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

史沫特莱愿作“大地的女儿”，“为整个大地而斗争”。至此，她已经成为一个有坚强的信念，愿意为真理、为被压迫者而斗争的新女性了。

(二)

1928年底，经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介绍，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她是经过原苏联西伯利亚，乘坐火车进入中国的东北的。

一登上中国大地，她发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和经济侵略，中国到处呈现一片民生凋敝的状况，使她大为惊异。原本自以为是完全了解贫苦味道的她，却深深感到中国东北老百姓贫困的现实，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好像是跨进了另一个世纪，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面有饥色无家可归的人群。

史沫特莱怀着对中国苦难老百姓的巨大同情，立即开始了工作，她针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军事占领，写出详尽的报道。可是她寄到编辑部的这些稿件，却没有能够及时地刊登出来。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变成现实，事实证明了史沫特莱的判断正确、报道真实，那些旧日她写的报道才陆续地刊登出来。这些文章，于1933年集成《中国人

的命运》一书出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向全世界披露了在殖民主义者铁蹄蹂躏下中国人民的不如牛马的生活惨状，正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位女记者——史沫特莱。

1931年的一个夜晚，史沫特莱在鲁迅的上海大陆新村家里，倾听了一位从江西革命根据地来的红军干部，讲述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夺取反“围剿”胜利的情况。路易·艾黎在现场为她作翻译。她不计个人的安危，立刻把她听到的关于红军的真实情况，连同江西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撰写成文章，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史沫特莱常常在自己的寓所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伯尔尼”公寓，会见革命工作者。有一回，经上海地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介绍，她同江西红军的一名干部作了长谈。为了这位红军干部的安全，她机智而巧妙地把这位干部化装成“修鞋匠”，使这位红军干部安然离开国民党戒备森严、密探遍布的上海。送行的路上，她把一支用贝壳镶嵌装饰枪柄的手枪，装在手提包内，紧紧跟在这位红军干部的后边。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她写成了《红军在前进》一书，把中国工农红军冲破黑暗的胜利消息传播到全世界。

史沫特莱对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背景，是这样分析描述的：

“1930年10月底，第一次大‘围剿’开始了，上海和中国各大城市的赞美声高入云霄。刚刚打垮北方军阀的蒋介石又派出10万部队，来进攻江西的‘赤

匪’……共产主义者是中国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妥协的力量，其成员用事实证明，他们愿为主义而献身……国民党报纸和它的外国同行喧嚣一时。”

1930年的夏天，史沫特莱和鲁迅第一次见面后，便结下了深厚友谊。上海左翼文化界为祝贺鲁迅50寿辰，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集会。为了躲避国民党密探的耳目，委托史沫特莱以她自己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租用了一家小型的荷兰餐室的花园。这次集会有上海左翼文化艺术界的作家、教授、记者、演员和学生一百多人参加。这次集会上，她听人讲述了在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道路以及湖南、江西边界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的事实真象。就是在那次集会上，鲁迅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后，对大家讲述了他自己的半个世纪经历和感慨。鲁迅说：“我是根植在农村和农民中间的一个。我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工人、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他还说，“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

这次会见以后，她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和茅盾等许多革命作家，并自愿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后来她还常说：“我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史沫特莱1929年至1936年间，在上海勇敢地投身到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之中，撰写了大量热情讴歌中国人民斗争的文章，介绍江西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与斗争。她帮助鲁迅把文章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帮助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运送枪支；在宋庆龄支持下，她还为红军搜集药品；协助创办宣传抗日统一

战线的英文杂志《中国之声》，等等。

史沫特莱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工作，并带领许多人加入到中国人民革命的激流之中。原中华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在回忆同史沫特莱相识，走上革命道路时，写道：

“三十年代初，那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初到上海，她（史沫特莱）给我巨大的影响。她像火一样激励着以路易·艾黎、汉斯·希伯、魏璐诗等为首的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使我们了解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于1936年决心参加中国红军，也受到她的很大影响……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着强烈而深切的信念……史沫特莱热爱人民，憎恨敌人，不惜呕心沥血，将她的爱憎化为行动。”

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爱护。她第一个向国外介绍了中国“左联”的活动，并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血腥镇压革命作家的罪恶行径。1931年她写了《冲破中国的黑暗》一文，文章登载在美国的《新群众》杂志的一月号上。她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文化“围剿”，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作家的坚决反击，都详尽地披露于世人面前。193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秘密逮捕杀害24名作家、艺术家和革命青年，其中青年作家柔石、李求实、殷夫、胡也频、冯铿5人，也同日遇难。史

沫特莱得到这则消息后，立即去鲁迅家中通报给了鲁迅。鲁迅对她非常信任，连夜撰写出《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犀利的战斗檄文，并请她翻译成英文，发向国外。史沫特莱非常关心鲁迅的安危，告诉鲁迅：“若刊登出来，先生的生命便会有危险！”鲁迅愤怒地告诉她：“这有什么关系？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她同茅盾一起按照鲁迅的要求，译出了稿子，另由鲁迅草拟了一个宣言，发向国外。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怀有正义感的世界人民的注意，美国 50 名著名作家，很快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愤怒抗议国民党政府残酷屠杀中国作家的罪行。她崇敬鲁迅，关心鲁迅的安危和身体健康。1935 年 11 月，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 18 周年的集会上，她看到鲁迅的身体虚弱得厉害，就又一次劝鲁迅出国养病。鲁迅对她的好意深表感谢，告诉她说：“局势瞬息万变，我怎么能独自远行？”1936 年夏天，鲁迅的病情越发沉重，茅盾把鲁迅的病情用电话通知她后，她立即请了一位美国治疗肺病的专家，为鲁迅诊断。医生告诉她，鲁迅的肺病情况十分严重，她悲痛异常，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掩面哭泣起来。鲁迅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史沫特莱说：“必须有人战斗！”1936 年 10 月 19 日，伟大的中国革命文艺旗手鲁迅逝世后，她和上海人民一起参加了追悼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战士的大会。鲁迅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永远鼓舞着这位来自美国的女性。

1936 年 12 月，史沫特莱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华记者，到西安临潼进行新闻采访。这期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她目睹了这场复杂事变的发生经过，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报道了“西

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国国民党的头目蒋介石“剿共”阴谋的失败，在临潼被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逼答应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囚禁，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等等。她不但撰写成文章报道，还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史沫特莱还参加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我国著名作家柳青，曾经亲眼看见这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站在西安城的鼓楼上，和示威群众一起高呼抗日口号。

(三)

后来，史沫特莱前往她向往已久的延安访问，从那时起，她勇敢地踏上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前线。

在《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史沫特莱生动地回忆了她到达延安的情况。她写了她到延安，是抱着一种好奇心的。一天晚上，在马海德的陪同下，她见到了中国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她详细地记载了这次会见的具体情况：

“这时，一个穿着蓝布棉军服的矮而健壮的人的身影，从点着蜡烛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于是，我看见了多年来我在我的文章中讲到过的朱德。的确，他看起来像红军的父亲。他已经过了 50 岁，他的面孔和蔼可亲，布满着皱纹。他宽大的嘴带着欢迎的笑容张了开来，向我伸出双手，我就张开双臂，抱住他的颈

子，亲了他的两颊。马医生也张开他的双臂，抱住朱德，带着响声地亲了他。”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对朱德说：‘让我仔细看一看你，多年来，我就听说你被称为土匪，你的头值两万五千元，而且你还是个已经宣告死过十多次的人。’随之，我又补充说：‘我给你带来了上海报纸上宣布你的多次死讯的一些剪报。’说着，我就从我的口袋里拿出这些剪报。当他看到一张据说是他的相片时，他尽情地大笑起来。然后，我们就谈起我的计划和他自己的工作。”

作为总司令，朱德那种平凡而又伟大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史沫特莱，后来她追忆这次会见时说：“就在他（朱德）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起我想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我就回答说：‘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事迹讲给我听。’‘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每十个中国人当中，就有八个是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事迹。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平都告诉我，也就是一个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生平的一部分。’他说道，‘等着吧，再找找旁人，会会别人，然后再决定吧。’”

史沫特莱从1937年3月开始，着手做写朱德传记的准备工作，每个星期用二个或三个晚上的时间，到朱德那里倾听这位“农民和士兵”讲述他具有传奇色彩的生平。平时，则在访问红军干部战士的活动中，留意有关朱德的材